

二十一世紀評論

第一次世界大戰及一戰 華工的世界意義



2014至2018年為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一百周年祭時期。目前全世界正大張旗鼓地反思這場戰爭的意義，但這一紀念熱潮在中國似乎沒有出現，國人似乎覺得其與中國無關。實際上，早在1914年秋一戰伊始，英國和日本即在青島與德國軍隊激戰，青島在該年11月落入日本之手。1915年日本趁列強集中投入一戰之中，無暇分心之際，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意欲渾水摸魚，置中國於日本控制之下。1916至1918年期間，大約十四萬華工前赴歐洲，在一戰西線戰場出生入死為英法兩國效力。1919年在戰後巴黎和會上，列強把山東割讓給日本，從而導致中國和世界局勢中一系列影響深遠的連鎖反應，五四運動就是其中的一個重要遺產。筆者在2009年接受《西湖》雜誌長篇採訪時，甚至大聲疾呼：「沒有一戰，何來五四？」^①

依個人淺見，一戰和一戰華工在歷史上對中國和中國人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中國的一戰及一戰中的華工同時也是世界文明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我們甚至可以從「一戰」角度來透視中國人如何尋求國際化及新的國家認同之漫長歷程，並通過分析國際社會應該如何更客觀認識中國與一戰的關係，深入理解一戰對中國及世界的重要意義。本文略陳管見及斷想，以就教於方家^②。

一 一戰與東西方文明和國際秩序

讓我們首先來回顧一下一戰歷史。公元1914年是中國的虎年，也是中華民國三年。就在這一年，人類歷史上所謂的「大戰爭」(the Great War)爆發。在下一場世界大戰(二戰)於二十多年後再次打響後，那場「大戰爭」成為今天人們所熟知的「一戰」。一戰一開始就被交戰雙方定義為「文明」之戰。協約國

* 1916年華工首次抵達第一次世界大戰西線戰場，謹以此文紀念一戰華工抵達法國一百周年以及一戰一百周年。

在戰後頒發給參戰人士的勝利勳章 (Inter-Allied victory medals) 上就刻有「為人類文明之戰，1914-1919」字樣^③。一位西方學者指出，一戰不僅僅關係到戰場上或者經濟上的得失，「對英國人來說，這是一場守衛大英帝國秩序的戰爭」；而與英國類似，德國人則認為這是「德意志民族的聖戰」。因此，「對德國人來說，這是一場改變世界的戰爭；對英國人來說，這是一場維護世界秩序的戰爭。德國人為未來而戰，英國人為傳統而戰」^④。著名的美國學者詹姆斯 (Henry James) 在戰爭開始不久即寫道：大戰爭的爆發或許會讓「文明陷入血與黑暗的無底深淵」，並「將打破有史以來我們對世界會變得更美好的幻想」^⑤。一位美國官員在戰爭結束不久後也寫道：「當世界大戰被真實地記錄下來，當勝利得到客觀的評價之時，我們會發現任何一個國家都不配享有文明勝利的桂冠。」^⑥因此，無論是戰爭剛開始或已結束，無論從何種角度上說，這都是一場人類歷史上影響深遠的戰爭，是對西方文明的一次血與火的殘酷考驗。而且在相當大的意義上，一戰的重要性遠勝於二戰。因為不僅二戰是一戰的延續，更重要的是直到今天，在一戰爆發一百周年之際，我們對這場所稱的「大戰爭」之於中國的意義仍缺乏真正了解，人們仍在辯論其影響及後果。

實際上，一場有關一戰意義和影響的辯論在一戰結束後隨即便在東西方展開。德國學者斯賓格勒 (Oswald Spengler) 宣稱一戰標誌着西方的沒落，是大家都熟知的^⑦。中國政論家梁啟超於1918年底到歐洲遊歷及考察後所撰的《歐遊心影錄》中，則聲稱一戰的結果顯示東方精神文明仍然有一定的優勢。他寫道：「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到如今卻叫起科學破產來。這便是最近思潮變遷一個大關鍵了。」他甚至用其飽含深情的筆調告誡中國人：「我們可愛的青年啊！立正！開步走！大海對岸那邊有好幾萬萬人，愁着物質文明破產，哀哀欲絕的喊救命，等着你來超拔他哩。我們在天的祖宗三大聖和許多前輩，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業，正在拿他的精神來加佑你哩。」^⑧對他而言，一戰幾乎將人類文明毀滅殆盡，而西方一直標榜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則難辭其咎。此外，中國知識份子如梁漱溟、辜鴻銘等均屬強調東方文明優越陣營之中的大將。當然，當時鼓吹東方文明至上的外國人士也大有人在，美國哲學家杜威 (John Dewey) 在1923年為另一位哲學家英國人羅素 (Bertrand Russell) 《中國問題》(The Problem of China) 一書所寫的書評中提到，在大戰後，中國似乎成為光明天使，映照出西方文明的黑暗。中國之道德準繩成為蝸子之鞭，抽打自以為是的西方人之背脊^⑨。

應該指出的是，當時並不是所有人都在東西方文明中站隊，比較兩者的優劣和長短。有部分十分理智的中國人呼籲大家要清醒認識一戰是人類文明的分水嶺，應乘此機會尋找一條適合中國自身發展的道路，不要汲汲於東西方文明之爭。如有人在1918年《晨報》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大戰即終，十九世紀文明告一段落，而二十世紀文明方從茲發展。換言之，即世界由舊時代而移入新時代」，「故我國民果欲為適應時勢之國民，第一須求得有方針之教育，第二須其方針無背於世界之新潮，否則惟有自歸淘汰而已。此則吾人所應大覺悟者也」^⑩。

一戰後在亞洲對西方文明批評最厲害也最有影響力的是印度著名詩人泰戈爾 (Rabindranath Tagore)。泰氏在1913年獲諾貝爾文學獎，是亞洲人第一個獲此殊榮者，聲譽遠揚，所發言論自然也較引人注意。泰氏在1921年寫道，生活在東方之外的人現在必須承認歐洲已經徹底失去其過去在亞洲的道義上的優越感。它在世界上已經不再被視為公平的代表和高尚原則的奉行者，充其量只是個西方種族優越論者和對非西方人的剝削者。泰氏在戰後給同樣也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法國作家羅蘭 (Romain Rolland) 的一封信中寫道，「亞洲幾乎每一個角落都對歐洲不再喜愛」。對泰氏而言，披着文明外衣的西方過去在中國這樣一個偉大的國度所投下的毒藥在戰後必將禍及自身。所謂的歐洲文明之火炬也許不再是燈塔，而是用來殺人放火的東西^①。

一戰不僅是對西方文明的巨大挑戰，並導致東西方文明之間的一場大辯論，同時也對世界文明地圖的重新整合及布局發揮了重要影響。一戰是日本的所謂「天賜良機」^②，日本通過一戰一舉成為世界強國，在巴黎和會上躋身世界五強之列。但即使在大發一戰外交和經濟橫財的日本人中也有不少人在戰後產生疑惑和很強的失落感：其一，日本固然通過一戰一躍成為世界五強之一，但西方列強對日本在巴黎和會上提出的「種族平等」議案嗤之以鼻，拒絕接受。在種族問題上，日本還是同其他亞洲國家一樣，無法同白人國家平起平坐；其二，畢竟日本是靠德國軍事化模式發迹的，德國在一戰被打敗的結局及一戰後流行全球的所謂「反軍國主義」思想，讓不少日本人懷疑日本是否根本上就選錯了立國模式，懷疑自明治維新以來奉行的所謂「脫亞入歐」政策是否明智。

同樣通過一戰躋身世界強國的美國，對一戰的影響和後果也是充滿疑慮。美國人在「為民主而戰」(the war for democracy) 的口號下加入一戰的戰團後，發現戰後的世界秩序並非如他們所願。美國總統威爾遜 (Woodrow Wilson) 一度被世人奉為為全世界帶來希望的神明和救世主，連以「老虎宰相」著稱的法國首相克里孟梭 (Georges Clemenceau) 都感慨，上帝只給了人類十誡，但威爾遜卻給了我們「十四點」世界新秩序藍圖^③；後來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陳獨秀曾聲稱威爾遜是「世界上第一個好人」^④；甚至連泰戈爾也要寫書題贈給他^⑤。在戰後巴黎和會上，威爾遜雄心萬丈，立誓要建立在美國主導下的世界新秩序，並建立國際聯盟，為萬世開太平。然而，美國人最後拋棄了威爾遜及其國際願景，美國國會拒絕批准《凡爾賽條約》(The Treaty of Versailles)，甚至不准美國加入威爾遜一手締造的國際聯盟。

可以說，一戰後全球的志士仁人、學者和政客都在疑惑、在思考一戰究竟會給人類帶來甚麼影響，並討論其是否意味着西方之衰落、科學之破產，抑或為人類社會帶來新的契機。以杜威為例，他曾對一戰後之世界寄予極高的期望。在1917年8月接受記者採訪時，杜威表示，我們在為民主而戰，因為這場大戰爭，「世界死了，世界萬歲！一個偉大的文明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會是一個全然不同的嶄新社會和文明。杜威雖然聲稱他並不知道戰後新世界究竟會怎樣，但顯然對戰後新世界的國際秩序充滿憧憬，儘管也有

不安^⑥。但在戰後，杜威對世界新秩序感到極其失望，也萌生了疑惑。但這是否意味着杜威也加入了對科學及西方文明持懷疑論者之列呢？杜威在五四運動期間來到中國，一待就是兩年多，中國是除美國之外他所逗留和生活時間最長的國家；他還被認為是中國五四時期風靡一時的兩大口號「科學」與「民主」的個人化身。由於杜威在中國的巨大影響，他被蔡元培等人稱為「美國的孔子」或「第二個孔子」^⑦。杜威的經歷和思考尚且如此，一戰的深刻意義和長遠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二 一戰對中國的意義

一戰對中國的意義無疑也特別重大，儘管很少有人意識到這一點。就中國而言，廣義的「一戰」可以說起始於1895年，終結於1919年。這期間的中國同春秋戰國時代一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各種思潮，東方的、西方的，都拿到中國試驗；共和政體、民主政體，杜威的哲學、羅素的哲學，各種學派和學者都在中國粉墨登場。這個廣義的「一戰」時代對我們中國人來說，就像英國作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裏所描述的那樣：「那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那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昧的時代。那是信仰的時代，也是懷疑的時代。那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那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絕望的冬天。我們似乎擁有一切，我們好像又一無所有。我們會直接進入天堂，我們也可能進入地獄。」^⑧

在廣義的「一戰」時期，中西方文明都處於重要的歷史轉折關頭。在中國，一代新人開始嶄露頭角。先進的中國人在1912年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國。及至新文化運動，新的思潮以及民族主義在中國風起雲湧。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已經受夠了列強的「強權即公理」的舊秩序，對當時的國際秩序亟欲去之而後快，代之以建立在平等、公正、民族自決之上的國際新秩序，並力圖以全新的姿態參與國際社會、成為其中平等一員。一戰的爆發，不僅對這一現存並對中國人不公的舊秩序帶來強烈衝擊，而且由於一戰歸根到底首先是一場西方文明內部極其慘烈的內鬥，也為西方文明的未來發展及歸宿帶來眾多的不確定因素。正是在這一中西文明處於極其重要的轉折關頭，中國人力爭順勢而起，藉此機會一展宏圖，重建文明，重整國運。

雖然一戰爆發已過去百年，但當年圍繞這場「大戰爭」進行的全球討論——有關世界秩序、東西方文明的興衰、科學及機器的論戰，在二十一世紀的現在，人們仍舊繼續討論，繼續疑惑，觀點仍舊莫衷一是。事實是，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的巨大考驗，西方文明依然處於優勢，跟一戰時期相比，今天科學和機器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甚至更為重要的角色，並為全世界所推崇和追求^⑨。中國自一戰以來無疑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戰爆發時，中國還是一個經濟上積貧積弱、政治上一盤散沙、外交上任人宰割的國家。今天的中國則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全球最大的貿易國，國際地位與日俱

增，堪稱今非昔比。可以說，列強在中國頤指氣使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然而，五四時期我們的先輩所討論、所糾結的問題今天仍舊存在。例如當時廣為討論的「何為中國、誰是中國人」，中華文明在國際上的地位如何，中國究竟需要有甚麼樣的國家認同等問題，到今天仍舊是我們全體中國人共同關心的核心問題。中國國家領導人目前大力推行的實現「中國夢」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計劃，同五四先輩所追求的理想無疑有異曲同工之處。

一百年過去了，現在當我們反思一戰的意義與影響時，也是深入思考一戰究竟為中國帶來了甚麼、又意味着甚麼的時候。事實上這是一個長期被忽視並急需面對的問題：第一，世界上不少人包括中國人自己，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都不太重視一戰與中國之間的相互關係及影響；第二，儘管這場戰爭發生於一百年前，但在今天的亞洲，它的烙印仍然明顯，特別是當我們試圖去理解為何中日關係總是問題重重時，尤其會感到一戰的深刻影響；第三，一戰對於中國的國家發展、外交政策，以及民族或國際意識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第四，今天的中國人仍然在尋找一個適合自己國情的新的國家認同和相應的國際地位。因此，理解一戰給中國帶來的影響無疑對於中國和世界來說都是極其重要的，或許正確解讀一戰歷史正是解開目前許多難題的鑰匙。

2015年是二戰結束七十周年，同時也是中國人在一戰中創造性地提出「以工代兵」、並因此把自己的命運同所謂的「大戰爭」聯繫在一起的一百周年紀念。在全世界正大張旗鼓地反思一戰的百年遺產並紀念二戰結束七十周年之際，也許我們應該把兩次世界大戰並置在一起進行思考，回答以下問題：二戰是否是一戰的延續？或者，是否因為一戰的後遺症造成了二戰的最終爆發？在這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哪一場戰爭對人類文明造成的影響更加深遠？何謂「二戰」？或二戰開始的時間及定義，是否不同的國家會有不同的回答？中國人對二戰的貢獻如何？二戰對中國歷史進程的巨大影響又何在？

在相當大的意義上，一戰的重要性遠勝於二戰。當我們在檢討二戰對中日關係及兩國歷史發展進程的影響時，也許應該把一戰以及二戰作為一體加以分析，並進而同中日甲午戰爭並置在一起來思考。換句話說，兩次世界大戰是中日兩國從1895到1945年五十年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唯有從這一角度出發，我們對中日兩國的近現代進程才能看得更透徹，得到的認識和理解也會更為深刻。杜甫詩云：「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也許從中日「五十年戰爭」的角度來俯視兩次世界大戰，許多似是而非的觀點就能露出真面目了。

從廣闊的國際史視野而言，在時間上，二戰的起源可謂因不同地區而異。對歐洲人來說，二戰起源於1939年應無問題；但從美國人的角度，二戰可以說是被日本人「炸」進來的。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一舉把美國人拉進戰爭，美國人加入二戰後，自然成為中國人的重要盟友。但對中國人或日本人來說，二戰如果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算起，可能是十五年戰爭；如果從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算起，則為八年戰爭。從中日「五十年戰爭」觀點來看，我們可以認為，中日甲午一戰一舉奠定了日本的東亞大國地位，並讓日本成為西方意義上的殖民帝國。因為日本通過甲午一戰

攫取台灣並將其變為殖民地，同時也為1910年將朝鮮正式變為日本殖民地打下了堅實基礎。

一戰對中國人的重要性還體現在目下中日關係的種種討論之上。今天世界不少評論家、學者和政客討論到中國，尤其是中日關係時，都喜歡用一戰作比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於2014年1月在瑞士達沃斯的世界經濟論壇上告訴全球舉足輕重的聽眾，目前中國和日本之間的競爭與德國和英國之間在一戰之前的競爭類似，暗示他們之間的分歧可能會超越他們密切的貿易關係，而中國則會扮演德國的角色。中國人當然不會喜歡被比作一戰中的德國。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於同年3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年度會議期間在新聞發布會上強調說，「2014不是1914，2014更不是1894」，以及日本「與其拿一戰前的德國來做文章，不如以二戰後的德國來作榜樣」。但與此同時，王毅在回答一個日本記者關於中日關係惡化的問題時也警告道，中國「在歷史和領土這兩個原則問題上，沒有妥協的餘地」^②。中日之間的外交緊張情緒似乎已經在全球範圍的外交事務中升溫，所有人都明白這兩個國家之間的敵對關係。然而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意識到，兩國之間的關係在一戰期間及之後更為糟糕，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戰爭期間及之後的局勢所造成的，因此中日之間目前的關係可以放入一戰的歷史背景下來理解，這樣人們才能對之有深刻的認識。

總之，要了解一戰對今天中日關係的重要意義，我們必須明白中日之間在一戰之前及期間究竟發生了甚麼。此外，要了解一戰對中國的重要性，我們還要再進一步回顧1894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因為正是這場戰爭為後來中日兩國相繼加入一戰打下基礎。我們唯有深刻理解一戰對中國和日本的影響，才有可能真正懂得二戰對中國和日本的重要意義。

三 一戰華工及其意義

要理解中國人與一戰的關係乃至中國與世界的關聯，沒有甚麼比通過一戰華工的視野對其進行審視更有說服力了。一戰期間，歐洲籠罩在一片腥風血雨之中，西方文明危在旦夕。在這場決定西方文明生死存亡的大戰之緊要關頭，十四萬中國農民在中、法、英等國政府的安排下，背井離鄉，遠涉重洋，作為勞工、苦力來到戰火紛飛的歐洲，來到法國，為英、法的生存，為拯救西方文明，赴湯蹈火，拋頭顱，灑熱血，譜寫了東西方文明交融的一曲壯歌，這也是人類文明史上東西方交流的重要一章。雖然這些大多目不識丁的中國農民在一戰期間赴法的主要動機是謀生，但他們用自己的血與汗甚至寶貴的生命，參與拯救西方文明，並通過同西方文明的直接接觸，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觀、中國觀、世界觀，從而進一步為中華民族逐步走向國際社會，為中國尋求新的國家認同，作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

然而，中外學術界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似乎將這一特殊群體集體遺忘了。西方人將它們擠出了歷史記憶，國人很少知道這一群人，更不用說了解

他們的壯麗歷程了。標誌着東西方文明交流輝煌一幕的這段往事，似乎已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中。在世界史、中國史、世界軍事史乃至中外文明交流史中，很少有人提到一戰華工的貢獻。在眾多捐軀歐洲的一戰華工墓碑上，大多刻有「勇往直前」、「鞠躬盡瘁」、「雖死猶生」、「流芳百世」等字樣。的確，他們在一戰西線戰場上或後方，固然是「勇往直前」、「鞠躬盡瘁」，但遺憾的是他們並沒有「雖死猶生」或「流芳百世」，而是被人們所共同遺忘。

相關政府對一戰華工貢獻的承認，更是姍姍來遲。早在1925年中國北洋政府即要求法國建立一戰華工紀念碑，以及為一戰華工提供撫恤金和遣散費等，但法國方面以資金短缺為藉口，一直未能兌現^①。遲至1998年，法國政府才在巴黎第13區中國城內豎立了一座紀念碑，上書「紀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為法國捐軀的中國勞工和戰士」。1990年代，法國導演紀頓(Olivier Guiton)鑒於法國人民對這一中法交流史上的壯麗篇章幾乎忘卻，拍攝了近一個小時的紀錄片《一戰中的14萬中國人》(140,000 Chinois pour la Grande Guerre)，向法國人民介紹一戰華工及其歷史貢獻。該片的重要價值在於採訪了一些定居法國的華工後代，通過他們的講述，再現當年一戰華工及其後代融入法國社會的故事。通過這部紀錄片，一般法國人才意識到一群中國農民參與創造法國歷史的突出貢獻。

2008年秋，在山東威海市檔案局的精心策劃組織下，就在一百年前許多華工跨出國門遠赴法蘭西的出發地威海，多國學者濟濟一堂，探討一戰華工的歷史。為配合首屆一戰華工國際學術會議在威海的召開，威海市檔案局還同時舉辦了一戰華工圖片展覽^②。2009年，中國中央電視台拍攝的六集紀錄片《華工軍團》則第一次把一戰華工的生活及事迹推到國人面前。儘管如此，時至今日，大多數人仍不太明瞭這些華工為何而來，因何而去。在旅途中，在歐洲以及回國後，他們究竟又有怎樣的經歷？他們對那場「大戰爭」是否做出過任何貢獻？他們對中華民族尋求新的國家認同及中國國際化是否發揮過重要作用？他們在中西文明交流史上又佔有何等地位？

不管他們動機如何，一戰華工實際上是用他們的「苦」和「力」參與東西方文明的重建，重寫人類文明的新篇章。就是在中國，他們也是一群非常普通的中國人，但他們的經歷，他們的人生，創造了人類文明史上不朽的傳奇。他們的命運，甚至他們的生命，無疑同中國及世界前途息息相關。一戰中抵達法國的十四萬華工，在許多人眼裏，也許只是苦力，在歐洲，他們吃盡了苦，出盡了力。因為華工源源不斷的到來，英法諸國在大戰危機關頭才可以免去人力資源匱乏的後顧之憂。也許華工到歐洲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謀生，但是大而言之，他們是為了中國，為了世界。儘管當初他們並非懷着創造歷史的抱負走出國門，但他們是中國放眼走向世界，參與國際社會的先行者，並直接參與創造了西方的歷史。

一戰華工甚至給中國最終直接參戰提供了法理根據，為中國的戰後外交創造有利條件，並最終幫助中國政府以平等一員的身份走向世界。1917年8月，中國歷經三年的奮鬥，終以華工死於德國潛艇攻擊為藉口，正式向德奧

宣戰。中國的對德宣戰，不僅展示了中國利用外交進入國際社會成為平等一員及尋求國際化的成功之舉，並首開中國從鴉片戰爭以來系統收復國家主權的先河。中國甫一宣戰，不僅立即宣布中國同德奧兩國所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隨之廢除，並收復德奧在中國的租界，終止支付德奧庚子賠款，更重要的是，德奧在中國的治外法權也被中國一舉取消。中國人堅持不懈地利用歐戰的爆發力爭正式加入戰團，充分反映了中國人尋求國際化的決心。中國以參戰外交一改以往中國人傳統而落後的世界觀，承認西方主宰世界體系，並力求加入國際社會成為受人尊重的平等一員。中國能夠躋身戰後巴黎和會本身，即是中國一戰外交成功的例證，實現了其在戰爭伊始即要參與和會的目標。因為華工的存在和可歌可泣的旅歐經歷，中國的外交官才能夠在巴黎和會上義正詞嚴地要求國際社會還中國公道。

一戰時的中國還是幸運的，儘管積貧積弱，儘管面臨許多內憂外患，畢竟還有高瞻遠矚的志士仁人提出「以工代兵」的策略；更有吃苦耐勞的農民赴湯蹈火，任勞任怨。正是精英與勞工的結合，讓中國得以在一戰期間譜寫了一曲中西交流的輝煌篇章。

在一戰爆發一百年後的今天，我們通過回顧和研究一戰華工的「苦」與「力」之悲壯人生，可以透視他們與中國及西方文明密切相關的命運。一戰華工被西方人稱為「苦力」，的確，他們很「苦」，但他們也有「力」，還有他們在血染的西線戰場戴瑞士表、太陽鏡、紳士帽，身着各國軍衣的浪漫，交法國女朋友的風流，以及為保衛自己的權益把欺負他們的美國大兵打得頭破血流的中國男兒的威風。一戰華工甚至是鄧小平等共產黨領袖在1920年代走出國門到歐洲勤工儉學的先驅。我們可以通過一戰華工的經歷及故事來探討中國國際史及中國國際化歷程中的平民參與及其貢獻，並通過一戰華工同西方文明及世界其他地區人民、中國精英的交往及密切接觸的經歷，分析中國人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並試圖回答「何為中國、誰是中國人」這一百年來中國人及世界各國人民所共同探討的世紀之問。

所以，這些華工的故事，可以說是文明交流的故事，同時也是1895至1919年期間包括華工在內的一代中國人為中國的國際化，為中國成為國際社會平等一員，為中華民族真正復興以及同西方人民一起共創人類和平而奮鬥的故事。華工雖然來自中國，但他們的歷史屬於世界。在我們同世界各國人民一起紀念一戰一百周年之際，讓我們緬懷由他們作為主角所創造的一段人類共享的歷史，尤其是中國在一戰中的歷史和一戰在中國近代發展中的影響及地位的歷史。

四 結論

一戰無疑在中國近現代史上佔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一戰的爆發不僅標誌着舊世界體系的崩潰，同時也為中國人尋求新的國家認同及國際化提供

了新的平台。一戰期間的中國社會是一個奇怪的綜合體：政治上民族主義高漲，文化上高度反傳統，外交上奉行國際化及國際主義。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既有學貫中西、以天下為己任的一大批社會精英，也有目光短淺、不知國家為何物的軍閥。凡此種種，莫衷一是。但就是在這種新舊混雜、天下大亂的局勢下，中國人開始系統書寫其以一戰為契機的尋求國際化及新的國家認同的壯麗篇章。中國的一戰外交及國際化努力是中國史乃至世界史上的重大事件。從某種意義上說，只有中國的參戰才使歐戰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大戰」或「大戰爭」。一戰使中國成為世界史的重要部分，中國同時也把一戰世界化了。

中國與一戰的關係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了中國後來的內政及社會發展進程。然而不論我們如何評論一戰對中國的意義，或中國對一戰的貢獻，我們首先都必須在一戰研究中恢復中國與這場「大戰爭」之間的關係的真實記憶。唯其如此，我們才能進而理解一戰的世界影響，並通過研究中國與一戰的關係，填補世界戰爭史、外交史、社會史研究上的空白。長期以來，中外學術界似乎一致公認五四運動和巴黎和會在中國歷史及世界史上的重大影響力，對此筆者並沒有異議。但需要強調的是，我們只有在充分理解中國與一戰關係之後，才能真正明白五四運動和巴黎和會的真諦及內涵，進而把相關研究推到新的高度。尤為重要的是，如果我們同意一部二十世紀的中國史實乃中國尋求國際化的歷史這一基本判斷的話，那麼，我們可以說中國的二十世紀是從一戰開始的，中國對一戰的反應及政策——包括「以工代兵」的重要決策在內——是中國積極主動走向國際化的開端。

中國參加一戰，從小處着眼是為了應付日本，為了在戰後和會上佔一席之地，但從長遠看，則是為了成為平等一員加入國際社會，為了國際化，為了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獲得發言權。在巴黎和會上，正因為中國代表團的據理力爭，並大義凜然地拒絕在對中國不利的《凡爾賽條約》上簽字，才把所謂「中國問題」帶到了世界最高論壇，並為山東問題在巴黎和會結束後的迅速解決提供了契機。因此，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不但沒有完全失敗，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是相當成功。沒有中國參戰及拒絕簽訂巴黎和會的對德和約，中國不可能迅速在1921年同德國簽訂平等條約，並在1922年迫使日本歸還山東。中德兩國於1921年所簽訂的條約是近代中國與一個歐洲大國簽訂的第一個界定雙邊關係的平等條約。更為重要的是，中國人在巴黎和會上積極參與戰後新秩序的建立。例如顧維鈞是起草《國際聯盟憲章》的十五人委員會委員之一，對憲章的撰稿貢獻頗多。中國人甚至從大局着眼，支持日本代表團在和會提出的「種族平等」條款。凡此種種，中國不僅讓國際社會聽見了它的聲音，還向全世界展示了其成熟的外交風範。而所有這些成就和建樹，都是與一戰期間旅法華工的貢獻分不開的。

華工的影響令世人矚目。中國政府同英法兩國政府聯手，把華工送到法國，中國的命運便與協約國聯繫在一起。華工不僅參與拯救西方文明，同時還是「再造中國文明」的一部分。一戰華工不僅為協約國作出了寶貴的貢獻，也為中國宣戰爭取了機會並出色地捍衛了國家利益。旅法華工大多都是普通

的農民，當他們被挑選前往歐洲時，對中國和世界都知之甚少。但是他們仍然用自己的力量，直接幫助中國改變了其在世界和國人心中的形象。他們以新的跨國身份重新塑造了中國的國家認同，推進了中國的國際化進程，進而影響了國際新秩序的建立。他們從戰時歐洲的經歷中，與美國、英國、法國的軍人以及其他國家的勞工一起工作的經歷中，形成了自己對中國和世界事物的獨特理解和看法。而晏陽初、蔣廷黻、蔡元培、汪精衛以及其他許多未來中國的領袖人物，則通過他們在歐洲與華工共事的經歷，對他們的勞工同胞有了新的認識，並開始確信中國一定能成為更好的國家。

筆者認為，中國做出「以工代兵」的決定既是應對時勢的權宜之計，也是深思熟慮的戰略布局。這一前所未有的舉措是年輕的中華民國富有遠見的外交政策的產物。許多政治精英和公共知識份子都將「以工代兵」計劃和他們關於中國未來發展的憧憬以及中國在國際大家庭中獲得平等地位的目標緊密聯繫在一起。因此，不論我們如何評論一戰對中國的意義，或中國對一戰的貢獻，我們都應該把中國（特別是一戰華工）帶回一戰的集體記憶之中。對二十世紀的中國來說，國際化和民族主義猶如一枚硬幣之正反兩面。通過研究一戰旅法華工和他們的故事，我們不僅可以重新恢復「一戰與中國」及「華工與一戰」這些被中國和世界歷史遺忘的記憶，並且可以進一步幫助中國人及世界各國人民通過歷史上這一精彩篇章，認識和理解中國人一個世紀以來重建中國文明及參與國際社會的心路歷程。也許這就是一戰和一戰華工對中國和世界的意義。

註釋

① 劉濤、徐國琦：〈「沒有一戰，何來五四？」——徐國琦教授訪談錄〉，《西湖》，2009年第7期，頁99-105。

② 本文基於筆者近年所寫的一戰系列文章及著作，文章包括徐國琦：〈一戰期間中國的「以工代兵」參戰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對中國歷史進程的影響〉，《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0年12月號，頁53-62；2005年8月號，頁40-49。主要著作包括Xu Guoqi, *China and the Great War: 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中譯本參見徐國琦著，馬建標譯：《中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納入「人文經典文庫」系列；Xu Guo-qi, *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中譯本參見徐國琦著，潘星、強舸譯：《一戰中的華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筆者目前剛剛為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完成英文版《亞洲與大戰》（*Asia and the Great War: A Shared History*），以及為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撰就《為文明出征：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西線戰場的華工故事》，均擬於2016年底出版。

③ Dominiek Dendooven and Piet Chielsens, eds., *World War I: Five Continents in Flanders* (London: Lannoo, 2008), 8.

④ Modris Eksteins, *Rites of Spring: The Great War and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Age* (Toronto: Lester & Orpen Dennys, 1989), 116-19.

- ⑤ “Letter to Howard Sturgis”, 5 August 1914, in *The Letters of Henry James*, vol. 2, ed. Percy Lubbock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70), 384.
- ⑥ Isaac F. Marcossou, *S.O.S. America's Miracle in France* (New York: John Lane Company, 1919), 306.
- ⑦ 斯賓格勒 (Oswald Spengler) 所撰的《西方的沒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上、下兩卷分別於 1918 和 1922 年出版。其後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影響甚大。
- ⑧ 梁啟超：《歐遊心影錄》，收入沈鵬等主編：《梁啟超全集》，第五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頁 2974、2987。
- ⑨ John Dewey,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Middle Works*, vol. 15, ed. Jo Ann Boydston (Carbondale, I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08), 216.
- ⑩ 以芬：〈歐戰雜感(6)〉，《晨報》，1918 年 12 月 23 日，第 2 版。
- ⑪ Pankaj Mishra, *From the Ruins of Empire: The Intellectuals Who Remade Asia*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2), 186, 192, 210.
- ⑫ Frederick R. Dickinson, *War and National Reinvention: Japan in the Great War, 1914-1919*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35; Ikuhiko Hata, “Continental Expansion, 1905-1941”,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 vol. 6, ed. John W. Hall et al.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279.
- ⑬ Margaret MacMillan, *Peace-makers: The Paris Conference of 1919 and Its Attempt to End War* (London: John Murray, 2001), 40-41.
- ⑭ 陳獨秀：〈《每週評論》發刊詞〉，載《獨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頁 388。
- ⑮ Erez Manela, *The Wilsonian Moment: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igins of Anticolonial Nation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92.
- ⑯ John Dewey, “Sunday World”, 5 August 1917, manuscript,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 Central file, box 321/folder 13.
- ⑰ John Dewey, *Lectures in China, 1919-1920*, trans. and ed. Robert W. Clopton and Tsuin-chen Ou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73), 233-34; Joseph Grange, *John Dewey, Confucius, and Global Philosophy*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 vii, 30, 89; Barry Keenan, *The Dewey Experiment in China: Educational Reform and Political Power in the Early Republic* (Cambridge, MA: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77), 7, 35.
- ⑱ Charles Dickens, *A Tale of Two Cit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
- ⑲ 詳見俾耳德 (Charles A. Beard) 編著，于熙儉譯：《人類的前程》（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4）。
- ⑳ Edward Wong, “China's Hard Line: ‘No Room for Compromise’”, *The New York Times*, 8 March 2014, A4.
- ㉑ 參見馬驪編著，莫旭強譯：《一戰華工在法國》（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5），頁 442。
- ㉒ 詳見張建國主編：《中國勞工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9）；張建國、張軍勇編著，馬向紅、郭東波譯：《萬里赴戎機：第一次世界大戰參戰華工紀實》（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9）。